

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安礼伟 □张二震

中国全面实现对外开放,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事件。通过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快速发展。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大变局,其本质是世界经济进入了“规则重塑期”;“开放”已经具备了新的内涵,要素分工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背后的本质特征,开放由市场开放转向生产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由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延伸以及由双边开放转向结构性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开放新内涵的内生要求,反映了开放的结构共存特征,有利于避免“囚徒困境”式国际竞争的出现;世界经济进入“规则重塑期”,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治理新体系有自身利益需求,也必然为公正合理新规则的制定做出自身贡献;中国已经从“对外开放”阶段逐步转向“开放发展”阶段,其中重视“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将是重要趋势。

关键词:世界经济新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治理;开放发展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0)09—0023—09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0.09.004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全球范围看,国际经济格局出现显著变化,美国挑起全球范围贸易摩擦使得经济全球化遇到重大障碍,世界经济进入规则重塑期,全球经济发展出现显著不确定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超过预期的速度快速发展,迅速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新时代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重大基本理论问题:怎样准确把握“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怎样理解和如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什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全球范围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提升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中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需求和贡献是什么?新时代中国如何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层次,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对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这些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变化”是新时代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这是对当代世界发展特征的精准概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相互联系的诸多方面,本文拟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维度来解读“大变局”。

从制度和规则层面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期”。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x002)

作者简介:安礼伟,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二震,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

繁实施贸易保护,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退出或者威胁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其本质都是将这类行为作为博弈的手段,推动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并且更好体现“美国优先”的重塑方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重塑国际经济规则的需要来源于“大变局”的第二个层面,亦即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深刻变化。

从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相对提升,尤其是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改变使得世界权力结构多元化趋势越发明显。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将这种实力结构的改变归因于所谓的国际经济规则的不公平。二战之后国际经济规则的构建存在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GATT的建立都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二个特征是差别化待遇。考虑到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实力存在的巨大差距,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努力下,1974年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发达经济体承诺给予发展中经济体一定的优惠待遇,这个时代的贸易“公平”主要体现在“实质公平”(即适应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所给予的差别待遇)上。随着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意图以贸易战为手段改变国际经济规则中体现实质公平的差别化待遇是本轮国际规则重塑背后的重要动因,其追求的“公平贸易”的本质是“对等贸易”。推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经济实力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来源于“大变局”的第三个层面,也就是技术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演变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之后价值链分工逐步替代最终产品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和趋势。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腾飞提供了机遇,因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发展中经济体在不掌握核心环节生产技术的情况下进入以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可能,比如专业化生产这些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即便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缺乏有生产经验的本土企业,也可以通过允许或鼓励外资企业进入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为发展中经济体低技能劳动力红利的充分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发展中国家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的收益得到较多研究的关注,但同时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发达经济体也从中获益。一方面使得发达经济体生产要素得以更多地配置到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使得其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得以更好地发挥;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也能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整合发展中经济体廉价要素降低成本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在这个层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于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不满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全球经济地位,并且同时建立了在信息通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较为完整的价值链,其中中国尤其突出,这使得这些经济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了产业基础,形成了对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竞争关系;第二个方面,发达经济体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将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经济体客观上对发达经济体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带来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尤其是在短期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带来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这些国家产生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趋势,这也是全球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但是,将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归因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失偏颇,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全球价值链分工仍未兴起,中国也非对美出口大国,因此将美国国内差距的扩大简单说成是对外贸易的结果甚至是中国对美出口的结果或者是不公平贸易的结果即便在时间先后上也无法立足。应该说,美国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和科技进步导致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美国贸易特征和收入分配变化特征的共同原因。

概括起来看,世界经济领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而复杂,世界经济处于“规则重塑期”,当今世界

范围的贸易摩擦更多的是表象,与其说是贸易摩擦不如说是规则之争,因此规则重塑带来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将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全球经济规则的重塑动因既来源于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转变,也来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现实。而不论是国际经济实力格局的变化还是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都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技术革命和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存在紧密关系。

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 开放 新内涵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对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战略机遇,从而出现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现象,出现了全球经济中心“东升西降”的趋势,其中中国发挥了巨大的引擎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走到十字路口和面临严峻挑战的关键阶段,基于对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和科学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呼吁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开放”,那么新形势下为什么要提出强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因为与传统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相比,价值链分工的实质是以要素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要素分工”,这使得世界经济的开放有了全新内涵。强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特别凸显和强调的“开放”,固然与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举措密切相关,但其理论和实践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演变和当前特征的深刻认知,以及发展趋势精准判断所进行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当代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向产品内价值链分工,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放型世界经济中的“开放”也必然与传统概念有重要区别。

要素分工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背后的本质特征。尽管全球价值链分工一词被经常用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之后盛行的全球产品内分工,但是这个概念更多地是属于现象层面的描述,“要素分工”才是其背后的本质特征。全球价值链旨在说明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和阶段,或者说不同增值环节被配置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型生产和组织模式,但却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当前生产要素流动及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还没有从本质上刻画当前国际分工的真实模式。毫无疑问,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重要基础,尤其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之间的产业间贸易。但是在传统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产业间贸易模型中,一国特定要素的禀赋优势的发挥是通过将该要素物化为该要素密集型商品并出口来实现。换个角度看,获取稀缺要素也只能通过进口该要素密集型商品来实现。而随着国际直接投资流动自由化的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一国依托要素禀赋特征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优势要素也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流入被其他国家厂商直接利用,稀缺要素也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流出从其他经济体直接获取。从这个意义上看,“要素分工”更能揭示当今国际分工的本质。如果说传统分工模式下,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来源于其本身要素禀赋特征,那么要素分工背景下,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仅来源于其自身要素禀赋特征,还来源于其利用他国优势要素,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

从“市场开放”转变为“生产开放”。与传统以产品为边界的国际分工中,“开放经济”是相对于“封闭经济”而言的,主要是交换领域的概念,指的是逐步削减或取消贸易壁垒,实现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开放”更多的从交换领域的概念转向生产领域的概念。在当今国际分工下,贸易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分工模式下国际贸易是为了解决商品生产地和消费地不一致,而当代国际分工下,国际贸易就是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中间品贸易就是典型的“为生产而贸易”。开放不再是限于商品能够自由进出关(国)境的“市场开放”,而更多体现在“生产开放”上,各国企业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市场开放向生产开放的转变必然要求一国开放由边境开放转向境内开放,因为在交换领域的市场开放阶段,开放主要意味着为降低商品进口的关

税或非关税壁垒,这个主要是边境开放的概念。但是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全球不同经济体都成为统一生产链条上的某个环节,分工延伸到一国内部,不同经济体需要实现生产一体化。这就必然要求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企业生产领域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等诸多制度层面做出相互安排,“一国国内的政策举措和制度设计,已经不再是本国自己的事,而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必须要能够适直接接受和容纳来自于他国的生产要素,要能够为吸引他国生产要素集聚乃至扎根提供适合生存的土地”。^[2]

开放领域从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延伸。开放领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既是开放领域不断深化和拓展的结果,也是国际生产网络发展的必然需求。国际生产网络意味着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在不同的经济体进行生产,这些生产环节直接需要通过诸如通讯、运输、金融、法律等服务连接起来构成完整的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全球化了,必然要求为生产过程服务的生产者服务业全球化发展,因为跨国公司生产触角延伸之处也要求相应的服务业为之配套,因此生产的国际化必然要求服务业发展的国际化。

从双边开放到结构性共存。传统以产品为边界的国际分工中,开放是双边现象,两个经济体相互开放市场就能获得国际分工的收益。但是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分工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共存现象。所谓结构性共存指的是开放不再是双边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是一个全球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国际分工现象,每个参与经济体都构成整体国际生产网络中不可替代或者难以替代的价值增值节点。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节点因为内生或者外生原因导致不能很好承担节点生产职能,或者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都将影响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有效运行。目前国际分工体系的结构共存特征使得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在观察和分析贸易问题的时候,仅仅从双边的角度出发也可能得到具有误导性的结论,比如中美贸易差额的问题。一般观点认为,中国对美长期具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重要诱因,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常常被归因于中国实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或者没有很好兑现加入WTO的承诺。这种仅仅从中美双边贸易角度看待中美贸易差额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中美贸易差额不是双边贸易现象,而是一个结构性现象,因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加工组装地的角色,对美出口中包含了大量从其他网络节点的进口,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被夸大了。

综合起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代“开放”已经具备了新的内涵。价值链分工背后是全球要素分工,要素分工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是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典型表现。全球要素分工的兴起使得传统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迫切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经济学理论体系。比如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开放中实现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从融入全球化到推动全球化乃至引领全球的历史性转变。上述变化显然与传统国际经济理论所揭示的“中心-外围”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理念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

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分工收益分配格局的深刻变化,因此也影响了不同经济体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分工模式的改变,使得发展中经济体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享受到信息通讯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收益,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经济发展表现。综合起来看,全球要素分工的兴起对世界经济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产生了深刻影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更加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不仅使得发展中经济体非熟练劳动红利得以充分发挥,而且得以进入新兴产业提升了产业结构,而在传统分工模式下,发展中经济体因为缺乏核心环节的生产技术,是难以进入新兴产业的。二是宏观层面的国家红利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红利逐步分离。企业以全球范围内利润最

大化为目标,其目标和母国或者东道国的目标(比如就业、税收和国家安全等)不一定保持一致,这就可能导致不同经济体出现“囚徒困境”式的竞争行为。三是在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加剧了资本和劳动要素以及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收入分配的差距。毫无疑问,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同样从国际要素分工中受益,但是主要体现在高技能劳动从中获益以及其企业从整合全球优势要素中获益,非熟练劳动力在短期可能从中受损,收入分配的改变必然影响其政策取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有利于避免国际竞争落入“囚徒困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相对经济实力下降,加之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对现有的国际分工制度安排提出挑战,并且将发动贸易摩擦作为提升博弈力量迫使贸易伙伴做出让步的主要手段,这种理念和做法的后果必然是使得相关经济体的博弈落入“囚徒困境”,威胁整个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变局背景下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为解决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在世界经济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契合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共存特征。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要素分工在进一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下不同经济体结构性共存特征也使得世界经济呈现出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双边经贸关系出现问题可能对第三国带来“溢出效应”,甚至威胁整个国际生产网络的顺利运转。应该说,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事实上已经使得不同经济体成为“命运共同体”了,“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这就需要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理念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现实的内在需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新兴大国而言,要将实力转换成影响力,其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向世界其他国家表明其将如何处理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个大国的崛起一定会带来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刻变化,此时如果能“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回答,十九大报告指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5]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规则重塑的方式与目标必然与传统国际经济治理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存在本质差异,也将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实现具有“共商共建共享”规则保障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实载体。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上涨以及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等问题凸显,意味着当前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和秩序面临局限和不足,亟待完善和重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目标,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破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包括经济全球化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原则和新的思路,为经济全球化新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和新活力。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为引领、以“共商共建共享”先进规则为基本遵循的一种开放式合作平台和经济全球化运行新机制。“一带一路”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全方位推进与周边国家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全面扩大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包容性发展。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国际规则的重塑

客观地说,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得益于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其至今仍然是当代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基础。外围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就是主张制定区别对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对发展中国家做出有利的特殊权利义务安排的规则,以弥补其竞争实力不足的弱势,从而求得与发达国家间表面上不平等、实质上公平的结果。^[6]作为发展中国家“斗争”的结果,“特殊与差别待遇”被体现在诸多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之中。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多个方面表现出重塑需求。第一,全球经济实力结构变化带来的重塑需求。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通常是由世界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状况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显著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全球经济实力的变化不仅仅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且这些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将它们组织起来,以协调与全球经济秩序相关的活动。第二,不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首先,基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成为重要的国际分工模式;其次,发展中经济体逐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也有整合全球要素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现实需求。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得侧重于“边境开放”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全球产业组织模式的变革和优化的深度需求。当边境开放促进了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从而使得产业发展具有全球生产网络的特点之后,由于包括生产等在内的经济活动已经渗入到各国境内从而呈现出“混血、交织”等状态后,开放及其相应的规则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边境”层面上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不断向境内开放措施拓展和深化,即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能更加体现制度型开放。

全球经济实力结构的改变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现有经济秩序产生了不满,主要体现在对于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给予发展中经济体“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不满,尤其是认为中国再享受发展中经济体的优惠制度安排是不合理的,并试图以贸易摩擦为手段逐步改变这种差别化的制度安排,形成所谓“对等的”公平贸易安排。对此应该看到,适应国际经济实力结构和国际分工变化,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相应变革是必要的,也是我们支持的。但是在全球治理结构重塑之中,以下三点基本原则应予以体现:一是应该承认发展中经济体相较于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尽管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获得了显著提升,但是也不能忽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和发达经济体依然存在的巨大差距而要求完全对等的所谓“公平贸易”。二是体现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必要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生产、贸易和投资领域重要性的显著提升,“使得西方工业化国家再也不能忽视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可能成为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力量”。^[7]如果新兴经济体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过程之外,事实上就不可能形成支撑全球要素分工的有效全球治理新体系,国际经济秩序难免长期充满不确定性。三是体现发展中经济体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需求。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发展中经济体主要作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国,扮演要素被整合者的角色,该角色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符合其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需求,但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也必然产生价值链攀升,提升价值链分工角色的需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发达经济体要求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削减贸易投资壁垒的同时,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发达经济体也需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公平的产业投资机会和市场机会。

中国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对于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善而非否定是中国利益之所在。习近平同志指出,“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国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没有前

途”。^[8]认为中国崛起对自由化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威胁的看法是具有误导性的,中国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加理解和欣赏该秩序。^[9]不仅因为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基本经验;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依赖于经济全球化,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中国制造能力与发展中经济体廉价要素优势和市场以及与发达经济体研发能力和市场等优势要素的整合。

中国需要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型,重视内需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下降,只是中国融入国际分工的动机和方式将出现一定的变化。从动机看,传统开放型经济模式注重通过充分实现要素红利以推动经济增长,而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实现企业微观竞争力的提升将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10]从方式看,将从传统注重出口和吸引外资流入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中国新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是扩大对外直接投资。^[11]因此,保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保持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对于中国有着重要意义。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仍然是中国利益所在,因此努力的方向是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合理地“扬弃”,在容忍的前提下加以改造,而不是对现存的经济秩序进行挑战和全盘否定。^[12]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力量的崛起使得中国的领导层对于其经济发展模式的信心增加。很多人相信对于美国而言主要的挑战是要意识到维持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中国的利益所在,该体系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将在维持该体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领导角色。^[13]中国理解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和积极主动承担国际义务,“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14]在全球经济规则重塑中,中国主动发挥影响力,还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新规则更好体现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基本方向,更好体现欠发达经济体的合理利益诉求,从而也能保证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五、从 对外开放 到 开放发展

中国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需要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15]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16]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充分实现了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长期稳定高速增长,同时在信息通信等高新技术产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内价值链,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大幅提升。中国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更加依赖开放,在开放中逐步实现从要素被整合者向要素整合者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体现在“量”和“质”的变化两个方面,不仅表现为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更体现在中国产业基础、要素条件和市场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产业基础看,良好的信息通讯产业基础为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提供了条件。从要素条件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有逐步削弱的趋势,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逐步显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规模都迅速提升,以2018年为例,本科毕业生数近387万人,研究生毕业数近60万人,这样就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高技能劳动力存量,这为中国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从市场条件看,伴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也得以显著提升,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中国内需市场的增长将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巨大潜在需求。可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备了产业基础、人才基础和市场基础。但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开放,一方面“关起门来”是无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正如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依靠开放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样,开放吸引高新技术产业或者环节外资的进入也是中国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高质量集聚整合全球优势要素

是提升中国企业微观竞争力、构建对外开放新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必然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环境,中国也必然坚持和加深对外开放的基本趋势。

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国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上屡次实施限制使得我们充分认识到关键技术和产品自主可控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17]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自主可控产业体系成为重要政策目标,但是同时也要准确理解建立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和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间并不矛盾。一方面,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并不是要求拥有特定产业价值链的所有环节,而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过去中国主要依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加工组装的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可能并不掌握核心技术,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实现价值链攀升,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由要素被整合者转为主动整合者,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通过开放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也是推动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对外开放”转向“开放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建立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传统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重要的特征,加工贸易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表现,这种模式在促进中国低技能人口红利实现,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模式下,中国成为国际大循环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相对滞后。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挥我国制造业基础优势、市场优势和逐步形成的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完善和提升国内价值链成为未来政策趋势。习近平主席及时提出了“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目标,^[18]这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这一改变既是应对诸如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和外部需求萎缩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中国未来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是核心技术与核心环节的自主可控,应主要建立在有效利用内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高技能劳动禀赋优势之上,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来实现。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绝不意味着不重视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作用,相反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离不开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也更加有利于实现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角色转型升级,增加在国际大循环中的竞争力,以更加有利的地位参与国际大循环,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

为更好实现“开放发展”,实行“制度型开放”也是必然举措。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形势和特点,就是从以往的边境开放不断向境内开放拓展和深化,即所谓的制度型开放。对此,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指出,“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19]

参考文献:

- [1]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1).
- [2]张二震,戴翔.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理论内涵、引领理念与实现路径[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5(2):83-94.
- [3]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莫斯科)[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3-25.
- [4]施展.枢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6]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186-204.
- [7]PRIYA S. Global Governance: Role of Emerging Economies dur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Journal of Politics & Governance,2013, Vol. 2, No. 1/2:116-124.
- [8]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8-09-04(1).
- [9]JOSEPH S. NYE, JR.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J].Foreign Affairs, 2017, 96(1):10-16.
- [10]安礼伟,马野青.国际经济秩序:中国的新需求与政策思路[J].经济学家,2019,(1):62-68.
- [11]LEMOINE F. From foreign trade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 new step in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J].Economic Change & Restructuring, 2013, 46(1):25-43.
- [12]张二震,方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4):5-13.
- [13]MORRISON, W. M. China's economic rise: 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M].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4.
- [14]习近平.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2014年12月5日)[NB/OL].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03/c416126-29742921.html>.
- [1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N].人民日报,2018-12-19(2).
- [16]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04-11(1).
- [17]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28/c_1122901308.htm.
- [18]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7月21日)[N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7/21/c_1126267575.htm.
- [19]习近平.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4-03-06(1).

(收稿日期:2020-07-22 责任编辑:张鹏)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of China's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 Li-wei, Zhang Er-zhen

Abstract: China's ful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deeply integrated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able to develop rapidly over the long term. However,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economy in the new era has produced a series of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to be solved. The world economy is facing major changes,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at the world economy has entered a "rule reshaping period"; "opening" has already possessed new connotations. The division of factors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behi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pening up has shifted from market opening to production opening, from commodity and factor flow opening to rules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openings, from manufacturing opening to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and from bilateral opening to structural coexistence.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n endogenous requirement for opening up new connotations,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structural coexistence, and avoid the emergence of "prisoner's dilemm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world economy has entered a "rule reshaping period." In this process, China has its own interests in the new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it will inevitably make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ulation of fair and reasonable new rules; China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opening up" stage to the "open development" stage, in which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mestic cycle" will be an important trend.

Key Words: New Pattern of World Econom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Open Development